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4.05.010

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著的明清诗词书写

葛文峰

(淮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安徽 淮北 235000)

摘要: 自1901年英国汉学家翟理斯在其《中国文学史》中首次介绍明清诗词, 至2022年中国香港学者张隆溪《中国文学史》的明清诗词书写, 120余年来, 英语世界先后有七部中国文学史著对明清诗词保持关注。在发轫期、发展期与深化期等不同阶段, 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对明清诗词的书写, 从诗人词人与作品的简单介绍, 到具体的批评与丰富的史述, 反映了其逐步走向系统化、深入化的学术过程。文学史著的书写侧重点映射出不同编者的研究风格, 折射出英语世界学者对明清诗词评判的时代特征与历史变化。

关键词: 英语世界; 中国文学史; 明清诗词; 书写; 海陶玮; 翟理斯; 张隆溪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4)05-0075-07

The Writings of Ming-Qing Poetry in the Chinese Literature History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GE Wenf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235000, China)

Abstract: In more than 120 years from 1901, when British sinologist Herbert Giles first introduced the poetry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his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o 2022, when Chinese Hong Kong scholar Zhang Longxi wrote the poetry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his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re are seven works of Chinese literature history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which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poetry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t various stages of its beginning, development and deepening, the English books of Chinese literature history write poem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rom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poets and their works to concrete criticism and rich historical accounts, which reflects the academic process of systematization and deepening step by step. The writing of literary history books reflects the research styles of different editors, and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historical changes of scholars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in the evaluation of poetry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Keywords: English-speaking world;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Ming-Qing poetry; writings; J. R. Hightower; H. A. Giles; Zhang Longxi

收稿日期: 2024-05-10

基金项目: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明清诗词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接受研究”(AHSKY2021D92)

作者简介: 葛文峰, 男, 山东莒南人, 淮北师范大学校聘教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英美汉学。

中国古典诗歌是英语世界最早关注、译介、研究的中国文学文体之一,唐诗宋词更是因其在中国诗歌史上的顶峰地位而备受青睐。比之唐诗宋词,其他时期的中国古典诗歌,从某种程度上说,遭受了英语世界学者的“冷遇”。

明清两代的诗词固然与唐诗宋词无法相提并论,但也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其代表性诗人词人辈出,诗论词论的理论水平更是空前。不过,直至20世纪初,英语世界对明清诗词的学术关注却不多见。当时的英国汉学泰斗韦利(Arthur Waley)甚至断言,宋代之后的诗歌无需过多关注。在他眼中,清代饶舌的诗人袁枚,不过是模仿白居易与苏轼罢了^[1]。好在与韦利同时代的另一位汉学名家翟理斯(H. A. Giles),已经关注到明清诗词。之后,英语世界的中国文学史对明清诗词的翻译、介绍和评价相继出现,其也成了英语汉学界认识明清诗词文学史重要地位和影响的主要路径。

截至目前,对于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著中明清两代的诗词书写,学界尚无系统性专题研究,现有研究多为以某部英语中国文学史著作为对象的个案研究。比如,时光介绍了陈受颐《中国文学史论》(*Chinese Literature: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与《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中对王士禛诗歌的译介及评价^[2];邹丽丹以《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剑桥中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为例,概述了当代英语汉学界的清代诗歌研究方法^[3];颜子楠探析了《剑桥中国文学史》中明代诗歌研究范式的“文学文化史”特色及其弊端^[4]116-125。

基于此,笔者拟以时间为序,全面评述英语世界七部代表性中国文学史著的明清诗词书写。

一、发轫期:1901年英语世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的明清诗词书写

1901年,曾两度荣获欧洲汉学“儒莲奖”的英国汉学家翟理斯撰写出版了英语世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该著首次以文学史述的方式向英语读者展示了中国文学发展的主要历程。翟氏《中国文学史》按历史顺序分为8卷,每一卷中均有诗歌叙录。“值

得注意的是,该书中大量篇幅用于叙述中国文学中诗歌文体的不同历史分期之作。”^[5]

翟理斯在《中国文学史》中追溯的“中国诗歌史”的早期代表作是《诗经》《离骚》。他认为,中国诗歌发展到明代时并未出现明显的衰退,只不过与唐宋时期相比,明代伟大诗人的数量明显偏少。翟理斯《中国文学史》依次介绍了明代的若干诗人诗作,这些诗人分别是解缙、朱厚熜(明世宗)、薛素素、赵彩姬、赵丽华。在翟理斯眼中,解缙年少聪颖,又系《永乐大典》总纂修,学识渊博,诗名远播。尽管翟理斯认为经过历代诗人编补的《神童诗》并非解缙一人所作,但是仍将其录在他名下,并翻译了该诗的大部分内容。难能可贵的是,翟理斯能从中西跨文化的角度诠释《神童诗》中的诗句,以便英语读者更深刻地理解原诗。翟氏解读道,《神童诗》开篇的“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对应着英语著名的谚语,即“Learning is better than house or land, for when house and land are gone and spent, then learning is most excellent”(读书总比房田好,房田售卖自有时,唯有读书价最高)。翟理斯重点叙录了明代歌妓诗人薛素素的生平、赵彩姬的《暮春江上送别》以及赵丽华的无题诗,将她们比作古希腊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等妓女;他认为这些女性的诗歌并不粗俗,反而是中国文学(古代诗歌)别具一格的样式^[6]329-334。

清代诗人中,翟理斯先后遴选了乾隆皇帝、袁枚、赵翼、方维仪等人作为评述对象。在评述乾隆的诗歌时,翟理斯写道:中规中矩,平常无奇。他以《戏题听鹂馆》为例,评点该诗虽为绝句,却又无“绝句”之“言尽意远”特征。在清代诗坛,袁枚的诗歌广为传颂,原因是其贴近生活,源自自然,情感真挚。袁枚不仅擅长讽喻诗歌创作,他在写景诗歌中表露的情感也能深深打动读者。赵翼是史学家,也是诗人,擅长创作绝句,诗歌内容不乏幽默色彩,《和友人落花诗》《野步》《咏古》是其代表作。翟理斯尖锐地批评了清代诗歌“为作诗而作诗”的创作倾向,认为这类诗歌缺乏含蓄的诗学艺术特质。在他看来,女诗人方维仪的创作打破了这种窠臼。青年寡居的她,在《死别离》一诗中表达的感情令人动容^[6]386,405-413,415-416,417。

郑振铎曾经批评翟著,认为其对中国文学史的

研究存在疏漏、滥收、详略不均、编次非法等弊端。实际上，翟氏对明清诗歌的评述，亦存在这些弊端。笔者推断，尽管翟理斯是著名汉学家，但是其涉猎的中国诗歌名家名作并不全面。事实上，翟氏所叙明清诗人，大多是不被中国文学史家、评论家所推崇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有可能是他以异域“他者”之眼进行遴选的缘故。郑振铎指出，明清两代诗人之中，“王世贞、吴伟业、黄景仁诸人，足以自立于不朽之境，而此书则连姓名都没有提及”^[7]。不过，这或许也正体现了翟理斯西方诗学视野下“明清诗歌简史”著述的独特之处。客观地说，翟理斯能把明清诗歌作为中国文学史（诗歌史部分）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视为中国古典诗歌在唐宋之后的进一步发展，这种诗歌史观还是值得肯定的。

二、发展期：20世纪50—60年代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著的明清诗词书写

1950年，美国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由汉学家海陶玮（James Robert Hightower）撰写完成的《中国文学论题——纲要和书目》（*Topics in Chinese Literature: Outlines and Bibliographies*）一书，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借此，美国汉学界可以不再借助欧洲的汉学文献而直接了解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8]。

陶著十分重视中国诗歌，其设专章分别详细叙述乐府诗、五言与七言诗、律诗、绝句和词，并专门记述了“宋诗派别”。海陶玮视汉、唐、宋为中国古典诗歌的繁荣时期，而对明清诗词几乎不着笔墨。在“词”史中，他只提及了清初词人纳兰性德。在他看来，宋代之后的词坛，只有一位词人可以比肩诸位宋代词家，即满族词人纳兰性德。纳兰性德的词多为爱情词，其格调新颖^[9]。《中国文学论题——纲要和书目》一书体量有限，其侧重于“论题”，而非选录作家作品，这就导致其重点述及汉赋唐诗宋词而极少触及明清诗词。海氏曾感慨：“（中国古诗）全盛时期在唐宋二代，历年积累下来的诗歌多得不可胜数。至于在各时期传世的诗人诗作更是不胜枚举。”^[10]这或许也是他在《中国文学论题》中对明清两代的诗人词人只“枚举”纳兰性德的原因。

1961年，美国迎来了第二部中国文学史述

之作——华裔汉学家陈受颐编撰的《中国文学史论》。德国汉学家、欧洲易学泰斗卫德明（Hellmut Wilhelm）感叹，这是当时中国、日本之外体量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中国文学史著作^[11]；为该书作序的林语堂也认为，该书将是日后相当长时间内英语学界的中国文学史权威之作^{[12]vi}。

陈受颐认为，印刷出版技术的革新和诗学标准的宽松是明代诗歌繁盛的主要原因。他提出，明初高启的诗词语言平实而富有深意，却不刻意师法唐宋诗词。15世纪开始，明诗以官宦台阁体著称。李东阳、李梦阳师徒以唐代诗歌尤其是杜甫诗为范例，倡导复古诗风。晚明“公安派”出现，其代表者袁宏道提出“性灵说”，主张诗歌抒发内心情感，其师承白居易、苏东坡。抗清名士陈子龙的诗词也别具一格。关于清代诗歌，陈受颐依次开列出数位代表诗人词家，略述他们的背景后，重点阐述其诗词特点。陈受颐认为，钱谦益是清初第一诗人，他的诗歌创作沿袭了唐宋诗风；吴伟业是钱氏同时代诗人，他以历史诗《圆圆曲》闻名；王士禛提倡“神韵说”，推崇王维与孟浩然诗歌；清代中期的袁枚是一位“离经叛道式”的伟大诗人，他主张诗歌创作应该抒发诗人内心最自然的情感。词在清代复兴，这一时期涌现出不少成就较大的词家。陈维崧、朱彝尊的词具有类似宋词的意境，满族词人纳兰性德的创作则传承了南唐、五代词风^{[12]515-518,541-555}。

与此前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的明清诗词书写相比，陈受颐的书写空前详细，尤其是在分析诗词内容与风格时，他能够翻译具体的诗篇作为例证进行论述，这大大方便了读者理解、接受这些诗词。不过，陈著的缺陷也十分明显，其缺乏注释与参考文献，“没有广泛征引当时东西方学界明清诗词研究的最新成果”^[13]，这使得其学术价值大打折扣。

三、深化期：21世纪之初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著的明清诗词书写

2001年，美国著名汉学家梅维恒（Victor H. Mair）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出版。美国汉学家马瑞志（Richard B. Mather）称赞该书为（英语世界的）中国文学研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有关散文、诗歌、小说与戏剧的分析，

体现出著者不凡的见解^[14]。《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第二编为“诗歌”，其中第二十至二十三章依次为“十五至十六世纪的诗”“十七世纪的诗”“十八至二十世纪早期的诗”和“清词”，由加拿大汉学家白润德(Daniel Bryant)，美国汉学家林理彰(Richard John Lynn)、麦大伟(David McCraw)执笔撰写。《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一书，是梅维恒召集北美汉学界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翘楚，博采众家之长，把他们最擅长的研究成果汇集成文之结果，这也确保了该书明清诗歌书写的质量。

白润德认为，明代诗歌的主脉是“终明之世，馆阁宗之”。“台阁体”宦士人的诗歌创作是其代表，明初“三杨”和于谦的诗歌创作莫不如此。北京与苏州，一北一南两座城市，是明代诗歌的中心。李东阳是复古运动至关重要的诗人，他不仅推动了该运动，还影响了大批年轻诗人。复古运动中的“前七子”“后七子”是当时的代表性诗人。明末以袁宏道为中心的“公安派”三兄弟，集中发出了“反复古”的声音。明清易代于17世纪，这一时期也是诗歌创作的繁荣时期。林理彰指出，17世纪前半叶的明末诗歌继续保持“性灵”诗学风格，高雅与通俗的界限日渐模糊。当时诗社盛行，诗歌创作活跃。清初40年间，诗人的创作转向对宋元诗歌风格的继承，复古主义创作得到革新与拓展，清代新的诗歌传统雏形初现。17世纪最后一二十年，新的诗学批评理念成型，新的诗歌流派得以确立，先后出现了“竟陵派”“西泠派”“岭南派”“江左派”等诗歌流派。有关18世纪至20世纪初清代中晚期诗歌创作部分的内容，亦由白润德撰写。他认为，“神韵派”王士禛是有清一代最伟大的诗人，其次是“格调派”的沈德潜。沈氏与厉鹗、赵执信、翁方纲的诗歌创作映射出清诗的形式主义传统；郑燮、袁枚与赵翼的诗歌展现了诗人各自的特质与视域，是清代的“性灵派”；龚自珍、黄遵宪等清末诗人的创作，更多地体现了朝廷衰败时期忧国忧民的主题。难能可贵的是，《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专辟一章书写清词。在麦大伟的汉学视野中，明代式微的词在清代复活了，而晚明诗歌界的复古主义、清诗受到的高压审查，以及文人、歌伎关系的密切，均为清词盛行的原因。陈维崧是豪放词的代表性词人，纳兰性德则是婉约词的代表性词人。18世

纪的清代词坛词派林立，主要词派是浙西词派与常州词派，其创作推动了清代词论的发展。“清末四家”词人继承了南宋晦涩、隐喻的抒情模式。值得注意的是，清词中女性词家的人数空前增加，徐灿、吴藻、顾太清等的崛起，为女词人在清代诗词中赢得了一席之地^[15]。

相对于“诗歌”编中的“唐诗”“宋诗”“元诗”，该书明清诗歌的撰写并未简单以朝代命名，而是在兼顾朝代的基础上，重点突出了明清两朝诗歌发展的时代特征与主题嬗变。这种打破以朝代为序的文学史书写具有显著的革新意义。当然，该书的明清诗歌编排或因集众家之力合作而成，不免有杂合、重复之弊。林理彰编写“十七世纪的诗”时曾论及陈维崧、纳兰性德等人的词，“诗词混杂，难以理出头绪”^[16]，而麦大伟在“清词”专章中再次详细探讨两人的词作成就。这反映出著者对“诗”与“词”的认知观点不统一。但白璧微瑕，瑕不掩瑜，诚如英国汉学家傅熊(Bernhard Fuehrer)所言，《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为英美读者展示了中国文学的瑰宝，其在章节之中梳理出不同文体的代表之作^[17]，英美读者通过此书亦可窥探明清诗词发展史中的名家名作。

2010年，作为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国别文学史”系列图书之一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在英美两国同时出版，该书由美国著名汉学家孙康宜与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联袂主编。孙康宜坦言，在以文类为基础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出版未久，《剑桥中国文学史》随即启动编纂计划，概因该书有着“特殊性”^[18]。这种“特殊性”主要是指其编书的原则为“文学文化史”。编著者采用文学文化的叙事模式，旨在撰写一部全新的中国文学文化史。诚如梅维恒的评价，《剑桥中国文学史》突破了朝代界限，意在展示文学发展，而非政权更迭。其也避免文体演进的专述，意在构建整体意义上的文学文化史^[19]。在此，明清诗词的书写也是文学文化史的书写。

孙康宜在“明代前中期文学(1375—1572)”的叙述中，重点关注了台阁体诗歌。她概括道，台阁体诗歌语言平白，主题单调且重复，但是因为其作者身为在朝宦官或翰林院士人而名声大振。台阁体诗歌多叙说官方政绩而缺乏抒情，内容更多地体现出官场模式化思想与儒家忠义观。以杨

士奇为首的“三杨”是明初台阁体代表诗人，其“正”的诗风代表了台阁体的精髓，具有明显的政治意蕴。明代中期之后，台阁体因士大夫阶层文学旨趣的多样化而产生新变，王鏊、吴宽等人的创作拓展了台阁体的主题，处于文化权力中心地位的李东阳的创作代表了台阁体发展的新方向。挑战台阁体的是复古派“前七子”，他们回归盛唐具有抒情典范意义的诗歌创作传统，兼及《诗经》与汉魏诗歌传统。同时，与北方的京城诗人对应，南方的苏州诗派兴起，其同样主张复兴古代抒情传统。明代中晚期诗坛以后期复古派的“后七子”著称，其先后以李攀龙和王世贞为领袖。编者认为，晚明时期没有诗歌经典，诗歌在晚明时期失去了文学史的中心地位，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商业写作冲击了此时的纯文学诗歌创作，这一时期甚至出现了职业诗人。相反，女性诗歌因未沾染商业气息而脱颖而出。晚明的商业出版极大地影响了诗歌的流传，譬如“竟陵派”因商业出版的助力，其影响远超“公安派”。明清易代之后，清初各类文体成就卓著，诗词也不例外。清初诗词展示了艺术关怀与政治考量之间的交互影响，形成了特殊的“诗史”风尚，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等人的创作是其代表。清初诗歌“以诗为史”，以时代更迭为背景，“记忆”社会变迁，力图在“新”与“旧”之间树立新的典范。乾隆时期是文人诗歌创作的顶峰时期，“神韵说”是此时精英士子的主流诗歌品味，例如沈德潜的诗作。沈氏之后，翁方纲作为“肌理派”倡导者，成为诗坛一代宗师。京城之外，李宪噩为代表的“高密诗派”、厉鹗与黄宗羲为代表的“浙江诗派”声名大噪。诸派诗词都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袁枚否定沈德潜和翁方纲的创作，倡导晚明的“性灵派”诗学，主张诗歌创作是内心天性的自由抒发。袁枚也是提倡闺秀诗词的领导者，他提携青年女性诗人，出版了《随园女弟子诗》。同期，苏州女性诗人的创作也较为著名，当时汇编有《吴中女士诗钞》。清末诗坛在内外局势巨变的情况下，开始了自我革新的道路。龚自珍的诗歌以主观情感抒发为主要特征，视“情”为人性精华；黄遵宪继承龚自珍的诗学主脉，其《己亥杂诗》彰显了晚清诗歌创作的变化与常态。与之相对，晚清也出现了主张“拟古”的汉魏六朝诗派、晚唐诗

派和宋诗派^[20]。

《剑桥中国文学史》的明清诗词书写综合而全面，其以政治中心京师的官方诗坛为主要研究对象，又兼顾了地方的民间诗词流派，还涉及国内外时局变革对两朝诗词发展的影响，体现了新世纪欧美汉学界对中国古代诗歌研究的侧重点。同时，随着西方女性主义作为文学研究视角在20世纪末期的兴起，该书中有相当篇幅涉及明清诗词的性别书写，对明清两代女性诗人词家创作多有撰述，竭力凸显了这一时期的“她者”声音。有关商业化与职业诗词创作、印刷出版技术革新与诗词传播的书写，是该书对明清诗词书写的独到之处，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不过，《剑桥中国文学史》的明清诗词书写，明显存在“文学本文”研究缺失的不足。其对诗词的剖析不够深刻，缺乏“文学性”阐释的力度，因而难以称得上是厚重的“文学史”。有论者认为，其编著者因此转而借助跨学科的“文化史”构建“文学史”，这是“一种被迫的创新。……进而创造了更多的阐释文学作品的可能性”^{[4]116-125}。

2012年，美国华裔汉学家桑禀华（Sabina Knight）撰写出版了《中国文学极简史》（*Chinese Literatur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这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牛津通识读本”系列丛书中的一部。汉学家许洁琳（Géraldine Fiss）称赞桑禀华将3000余年的中国文学史浓缩成一部简史，以中华文明基础性要素勾绘出中国文学发展脉络^[21]。

《中国文学极简史》的第二章为《诗与诗学》，其书写了中国诗歌的代表性诗人诗作与诗学理论。桑禀华对清代诗歌着墨最多。她指出，“飘逸”主题是中国封建时期诗学中的重要精神指向，即忧国忧民的士人常以诗歌创作作为悟道的门径，并倡导诗歌的这种功用。桑禀华认为，清初伟大诗人王士禛是其中的典型。他推崇个性化的、不可言传的“神韵说”，“神韵”即为与客观世界“妙在象外”特质相互融合的一种直觉。桑禀华发现，至17世纪中叶，清代王端淑、黄媛介等女性诗人成长起来了。她们的诗歌勇于表达个性，甚至抒发对明朝故国的怀念。例如，黄媛介的《题山水小幅》写出了诗人在满族征服与统治下的艰难处境。勇于创新的还有大师级诗人袁枚；为了对抗卷土重来的诗坛复古主义，他高举“性灵”大旗，

倡导极为现代的个人主义诗学理念^[22]。

2022年,香港城市大学比较文学与翻译讲座教授、欧洲科学院院士张隆溪编写出版了《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这也是新世纪迄今唯一一部中国学者以一人之力独立完成的英文中国文学史著作。与卷帙浩繁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与《剑桥中国文学史》相比,张著《中国文学史》仅有400余页的篇幅。其可谓一部“中国文学简史”,同时也是一部回归文学性(literariness)的文学史。《剑桥中国文学史》倚重历史文化语境对文学的塑造作用,张隆溪的著作则对此进行了有力的反拨。他明言,此书是一本“文学史”,而非一部以文学文本为佐证的社会政治史;“文学”是此书的焦点,非相关、非必要的历史背景他不准备作过多诠释^{[23]xv}。

张隆溪对明清诗词分而述之。他在“明代诗歌”专章中按照明代前中后期进行历时叙述,认为高启是明初的代表诗人,是元明易代之际乱世苦难诗歌创作的代表。14世纪末,经济与文化水平不断提升的江南出现了“吴中四子”诗人群体,他们的诗歌旨趣挑战了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明代中期,儒家正统思想逐渐与社会现实脱轨,台阁体诗歌创作受到质疑,“前七子”与“后七子”诗人群体便是此时的代表诗人。此后,明代诗坛提倡复古,师法汉唐宋三代诗歌风尚,徐渭与李贽的诗歌创作代表了这股追求精神自由的“拟古”潮流。晚明最重要的诗歌流派当属倡导“性灵”诗学的公安派。袁氏兄弟的诗歌语言通俗易懂,给读者不事雕琢之感,其看重的是诗人性情的真实流露。明末复社的陈子龙提出,诗歌既要抒发真挚情感,外在形式又须在继承古代诗歌传统基础上丰富、雅致。张隆溪指出,清初最伟大的诗人是钱谦益,其强调感情在诗歌中至关重要的作用。吴伟业也颇有诗名,其诗歌语言优美,擅长书写爱情。清初词学复兴,陈伟崧、朱彝尊等词人沿袭了南宋豪放派辛弃疾的词风。杰出词人纳兰性德出身满族贵胄之家却写出伤感、厌世的词作,其创作有南唐后主李煜之遗风。康熙时期王士禛提出“神韵说”诗学思想,其诗歌语言含蓄优美而意蕴悠长。查慎行、朱彝尊等人的诗歌传承了两宋诗风,是为“宋诗派”。沈德潜接受明代前后“七子”的思想,强调诗歌须关切现实,

突出政治与伦理主题。“浙西派”的代表诗人之一是厉鹗,他擅长自然山水诗歌创作。翁方纲是“宋诗派”成员,提出“肌理说”。张惠言是清代中期兴起的“常州词派”代表词人,提出“比兴寄托”的主张,强调要强化词的内容,而周济继承、拓展了此说。清代出现了“性灵派”的继承者。比如,代表者袁枚思想开放,持有享乐主义人生观;张问陶崇尚真情实感的诗歌,不炫耀自己的书卷知识;注重自我意识与个性张扬的还有“扬州八怪”。龚自珍是清代中期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诗人,其诗歌突出反映社会问题。1840年之后清朝内忧外患的情况,也反映在当时的诗歌创作上。张维屏、郑珍、黄遵宪多有反帝爱国、体恤民情的诗篇。黄遵宪是晚清诗坛“诗界革命”旗手,他创作了众多打破传统诗学规范、反映世界变革的诗歌作品。丘逢甲、康有为、梁启超均为“诗界革命”的践行者。张隆溪认为,清代诗歌作家众多,成就斐然,尤其是晚清诗歌,其尽管外部形式仍保持着古典的传统,但内容和手法逐渐走向了文学的新境界^{[23]310-327,348-367,381-388}。

张隆溪书写的明清诗歌史,回归到诗歌本体,坚持从典型诗词文本的剖析再现诗人词人的文学特质,其对于每一位述及作者的作品均给予大篇幅的内容、语言、风格等方面的分析。如此,张著便形成了其明清诗歌史述的“作者-背景-作品-评价”固定书写模式。质言之,张著是一部以中国文学史传统编纂规范为基础、以英文进行“讲述”的专书。该书里程碑式的意义在于,其面对熟悉西方文学理论的英语世界,开创性地撰述了中国学术传统视野下的文学史,开拓性地解构了西方中国文学史著作中的“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24]。

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对明清诗词介绍和评论的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翟理斯《中国文学史》是20世纪上半叶英语世界唯一一部中国文学史著,他肯定了明清诗词的价值,但是史料多、评价少,体现出发轫期的基本特征。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对明清诗词的书写逐步推进,是为发展阶段。相比海陶玮的论述极力推崇唐宋诗词、有关明清诗词的论述仅仅触及纳兰性德的情况,陈受颐对明清诗词的文学史书写空前详尽,

其内容丰赡，推动了明清诗词在英语世界的普及。新世纪以来，书写明清诗词的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著作不仅数量更多、内容更加深入，而且史论结合、视角多样的特征非常突出，这些论著也代表了英语世界明清诗词研究的最新趋势。

考察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中的明清诗词书写，不但可以为国内古典诗词研究者引入英语世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在中西学术交流互鉴的语境中，其也为如何撰写更为完备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提供了借鉴案例。

参考文献：

- [1] WALEY A. 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 [M]. London: Constable & Company, Ltd., 1918: 32.
- [2] 时光. 英语世界王士禛的译介与研究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2016, 37(8): 176-182.
- [3] 邹丽丹. 北美汉学视阈下的清代诗词研究 [D]. 长春: 吉林大学, 2019.
- [4] 颜子楠. 抒情与商业: 《剑桥中国文学史》中的明代诗歌研究范式 [J]. 文史哲, 2021(6).
- [5] BALL J D. Dr. Gile's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J]. The China Review, 1901(4): 209.
- [6] GILES H A.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M].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01.
- [7] 郑振铎. 评 Giles 的《中国文学史》[M]// 郑振铎. 郑振铎全集 6: 中国古典文学文论.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8: 51-55.
- [8] 刘丽丽. 美国首部中国文学史: 海陶玮《中国文学论题》探析 [J]. 国际汉学, 2022(1): 142-149.
- [9] HIGHTOWER J R. Topics in Chinese Literature: Outlines and Bibliographies[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92.
- [10] 海陶玮. 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 [M]// 中国古典文学翻译委员会. 英美学人论中国古典文学.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73: 260-261.
- [11] WILHELM H. Chinese Literature: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by Ch'en Shou-yi [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62 (3): 458.
- [12] CH'EN S Y. Chinese Literature: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M]. New York: The Ronald Press Company, 1961.
- [13] TEELE R E. Chinese Literature: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by Ch'ên Shou-Yi [J]. Books Abroad, 1962, 36(4): 452.
- [14] MATHER R B.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y Victor H. Mair [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03(1): 234-235.
- [15] MAIR V H.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390-452.
- [16] 张明强.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及其中译本评议 [J]. 国际汉学, 2018(1): 184-191.
- [17] FUEHRER B.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y Victor Mair Review[J]. The China Quarterly, 2004(178): 535-536.
- [18] 孙康宜, 宇文所安. 剑桥中国文学史: 下卷 (1375—1949) [M]. 刘倩, 王国军, 唐卫萍, 等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 1-2.
- [19] NIENHAUSER W H J.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J].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2011(1): 157-159.
- [20] CHANG K I S, OWEN 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Vol. 2[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16-17, 29-33, 59-62, 83-92, 180-185, 250-265, 330-333, 415-422.
- [21] FISS G. Chinese Literatur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by Sabina Knight[J].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2015(3/4): 202-206.
- [22] KNIGHT S. Chinese Literatur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44-45, 50-51.
- [23] ZHANG L X.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22.
- [24] 王骁. 张隆溪: 《中国文学史》(英文) [J]. 国际比较文学 (中英文), 2023, 6(1): 197-199.

责任编辑：黄声波